

丁云亮◆著

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

——1950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经验

博士文丛

• 第五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博士文丛

• 第五辑

Jieji Huayu de Xushu yu Biaoxiang

——1950Niandai Shanghai Gongren zhi Wenhua Jingyan

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

——1950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经验

丁云亮 ◆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1950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经验 /
丁云亮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212-03670-6

I. 阶… II. 丁… III. 工人阶级—文化社会学—研究—上
海市—1950 IV. D663.1;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2290 号

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
——1950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经验

Nar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Class Discourse
——On Cultural Experience of Shanghai Workers in the 1950s

丁云亮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大厦 8 楼

发 行 部：0551-3533258 3533268 3533292(传真) 邮编：230071

组 编：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话：0553-3937079 388357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芜湖新欣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965 × 1270 1/32 印张：10.5 字数：245 千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670-6

定 价：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中文摘要

上海解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阶层人群的地位交相更替的同时,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也遭遇剧烈的动荡。本文以文化社会学视野,通过观照1950年代上海工人阶级话语叙述的内容和方式,揭示地方性工人阶级的文化经验,使人们认识到新制度建构下的工人个体、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和阶级实践之间的表象关系,借助基层社会动员机制得以显现。以识字为中心的学文化运动,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上,重新唤起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提升了阶级成员的社会地位。在文化、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大力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使得职工群众在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中,进一步展现了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上海女工人数及在工人总人数中的比例,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妇女的就业领域扩大到各个部门,虽然频繁的政治运动难显真正的性别意识,但在公共领域高涨的参与激情,还是呈现出眩目的色彩。工会的转型主要是职能的变换,上海工会宏观结构单一、集中,在整个50年代,对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教育、生产建设及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按照行政和工会是紧密配合关系的要求,动员工人搞好生产成为工会的主要任务。空前庞大的科层制结构组织,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的稳定形象,上海的工厂也不例外,都属于国家宏观计划经济的一个个部件,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体系里与其他阶级、以及工厂内部,都形成新的人群关系,个体性话语与权威性话语、公共性话语时有冲突。

阶级话语强有力的、灵活的表达形式,既来自于对现实的反映,又有助于对新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它们通过诠释社会关系,形塑着工人的思想意识、价值信仰,同时与阶级实践建立联系,使他们自觉投身社会行动中去。但国家主义理念将阶级话语纳入自己体系的过程,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过程,延续下来的历史传统依然复活着上海工人文化自身的特质。

Abstract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accompanied with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he social structure had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Following the different social stratum substituting one another, the lifestyle of the urban people also encountered the extreme turbulence. Through observing the contents and modes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1950s in Shanghai, in a cultural sociology vision, this paper has revealed the cultural experiences of the local working class,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workers, the workers' group,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The symbol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w ideology discourse production and class practice emerged in virtue of the mobilizing mechanism of the grass roots. The campaign of learning culture which took literacy as its center awakened their self-consciousness and raised their social status through raising the workers cultural level. Through energetically fostering the working class intellectuals in culture, science, art and other fields, the working clas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ir wisdom and crea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female worker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Shanghai. Besides, the employment of them was extended to almost every field.

Though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frequently oppressed their real gender consciousness, their enthusiasm in the public domain was quite striking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e union marked by the change of its function mainly. In the whole 1950s, the trade union of Shanghai, which had a single and centralized macro-structure,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organizing the workers to accept education, participate in production and carry out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rade union should cooperate closely, the primary mission of the trade union was to mobilize the workers to work hard. The unprecedentedly gigantic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structure symbolized that the whol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as steady. In this structure, every factory was regarded as a part of the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So, some new human relations emerged in the society and the factories as well. In the new human relations, conflicts appeared frequently among individual discourse,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and communal discourse.

The strong and flexible expression forms of the class discourse came from the reality, and in the meanwhile maintained the order of the reality. Through account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these forms mold the workers' mentality and belief and made the workers exert themselves into social practice self-consciously by connecting with class practice. But, the process of the nationalism absorbed the class discourse into its own system wa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because the continuity of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to some extent still influenc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rkers' culture.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问题提出	1
二、理论构想	9
三、文献述评	24
四、研究方法	34
第二章 学文化	40
一、识字的政治	42
二、文化诉苦	59
三、新闻讨论会	82
第三章 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100
一、文艺实践	102
二、学理论	121
三、技术革新	132
第四章 新女工	153
一、妇女解放	155
二、平等意识	170
三、阶级身份	182

第五章 工会转型	195
一、组织教育	197
二、生产中心	209
三、职能危机	222
第六章 人群关系	232
一、道德经济	234
二、工农联盟	256
三、青工“三关”	272
第七章 结论:话语的秩序	285
一、强阶级隐喻	286
二、想象的共同体	291
三、地方性知识	296
附录一 访谈提纲	302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0)	304
主要参考文献	310
后 记	324

Contents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
1.	Raising of the question	1
2.	Theoretical structure	9
3.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bibliography	24
4.	Researching methods	34
Chapter two	Learning culture	40
1.	The politics of literacy	42
2.	Culturally complaining	59
3.	The discussion about news	82
Chapter three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working class	100
1.	The practi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102
2.	Learning theory	121
3.	Technical innovation	132
Chapter four	New female workers	153
1.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155
2.	Equality sense	170
3.	Class status	182

Chapter f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e union	... 195
1.	Organizing education	197
2.	Production center	209
3.	The crisis of functions	222
Chapter six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232
1.	Moral economy	234
2.	The alliance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256
3.	“Three-standard” of the young workers	272
Chapter seven	Conclusion: The Order of discourse	285
1.	Metaphor of strong-class	286
2.	Imagined community	291
3.	Local knowledge	296
Appendix one	Outlines of the interview	302
Appendix two	Trade Un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50)	304
Main Bibliography		310
Postscript		324

第一章 导 论

发现一种特定类型的模式,正是有用的文化分析的开始,而且正是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才是普遍的文化分析所关注的。

——雷蒙德·威廉斯

一、问题提出

作为实践性概念的工人阶级,历史可以追溯到 14—15 世纪欧洲的工场和手工业的产生,18 世纪的后半期,以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以及引发的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为其发展壮大、步入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抑或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工人阶级是作为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都业已成为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分层结构不可或缺的因素,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成为形塑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构成力量。

从世界历史来说,工人阶级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还不到两百年,但他们并没有一盘散沙,而是凭借资本和效率主导的机器大工业的召唤,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方式——工会,以此为强有力的纽带,不仅用它来维护自身经济、文化权益,还通过它进行阶级启蒙教育,乃

至把自己的组织从工作场所发展到社会上,从事报刊、音乐团体、剧院等宣传和组织起政党形式,直接管理国家,尝试着建立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关系。今天,尽管因消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商业化色彩更浓的服务行业急遽膨胀,导致产业工人阶级数量在下降,但其仍然被视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具有动摇社会根基的决定性力量^①。

近代大工业抑或说现代性语境的产物的上海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早期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三种近代工业而孕育、发展起来的。上海最早的工业工人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开办的企业中,鸦片战争发生之后,西方殖民者为了适应在华掠夺性贸易扩张的需要,首先在广州、香港投资设立船舶修造工厂,进入50年代外国资本在华设厂明显集中到上海;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国内“官办”军事工业,三十年间先后创办40多个工业企业,其中1865年在上海建立的江南制造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随着规模逐渐扩大,工人人数大量增加,1869年已达1300人^②;与此同时,中国商人自己创办的如缫丝厂、面粉厂、造纸厂、印刷厂等也相继在上海涌现。这些都为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甲午战争前夕上海工业企业的人数据现有资料估计约有3.7万余人,占当时全国工业工人总数的40%^③。虽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通过投资、自建的

① 基姆·穆迪:《产业工人阶级并未衰落》,郭懋安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5期。穆迪批评了彼得·德鲁克代表的把产业工人阶级开除出历史舞台的观点,认为流行的产业工人阶级衰落说相当程度上夸大了事实,因为统计方法是错误的;从资本主义的变化趋势看,当今产业工人成员远远超出了工厂蓝领工人及其家属的范围,还应包括在理论上被称为后工业化信息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的为数众多的工人。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③ 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企业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却应合了当时缓慢的制度改良运动及工业化发展的方向,引发了其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浪潮。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国家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更多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事务,中国民族工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虽然经历抗战、内战的挫折,到1948年,全市工厂数、工人数已占全国50%以上^①。

共和国的成立,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界碑。它不仅意味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政权的结束,还意味着新型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理念的确立,进而使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曾有记者以“速写”的形式这样描绘其时人们的激越感受:

从经济的角度看今日的上海,最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的翻身。上海是我国最早的工业中心,它的工业至今在全国工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过去长期在外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投机的商业资本的重重压迫之下弄得奄奄一息。在从前人们的印象中,罪恶的交易所简直成了上海的象征。一提到上海,人们不是首先想到它是工业城市,而是首先想到它是商埠,是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这是上海的耻辱,也是上海工业的厄运。^②

而现在,随着“人民—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人阶级被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政党视为领导阶级,必然在社会结构重组过程中承担别样的功能,尤其在规模、身份、权力方面,发生明显的变更。他们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教育诸领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①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当代社会》之《总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李普:《开国前后的信息》,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

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制度的运行,都不能不是引人注目的问题。仅从规模上看,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商业转工业的蔚然成风、现代化的发展指标以及大幅度提升的就业率,促成人数的连年迅猛增长。1949年上海市区职工人数为93.7万人,1952年125.1万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又增加了3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8万人,1958年底职工人数达203.0万人,1959年职工人数203.3万人,比1949年增加一倍以上^①;随着行政区域覆盖空间的扩大,郊县增多,1960年职工人数达285.95万人^②。

透视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现状,当下的社会学领域对1978年后尤其是转型阶段的专题研究成果渐多,有一批优秀的社会学家参与其中,并且已形成热点,他们多层面的理论概括和实证调查,为理解当下社会文化生态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而对建国后30年工人的阶层构成、生活状况、文化经验的研究,或付之阙如,或只作为研究背景一笔带过。而历史学领域,相对更加关注工人运动史的钩沉和研究,尤其对民国时期工运史案例的探究,材料充实,成果斐然。本文的目标是以1950年代,即建国初期的十余年微观社会史为线索,探询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上海工人阶级伴随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动,如何利用集体主义的文化习得,重构着新的阶级意识,相应地呈现出的崭新的行为动机、精神态度、价值信仰的“表象”^③,进一步推动社会机制运行的

① 上海市统计局编:《胜利十年——上海市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0—93页。

②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③ 表象最初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被挪移到历史学研究领域,尤其在后现代历史学家那里,获得了新的意涵。他们基于反抗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结构主义式的研究模式,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象征、语言,研究人们在社会中所形成的“形象”,以及这些“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本文使用时,吸收了对象征层面的“表象”研究视角,关注话语生产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

状况。通过对断代历史特殊群体生活方式的重叙,追述过往阶段上海工人阶级的文化积淀。

这一时期上海的工人与近代至民国时期的工人相比,无论是来源还是身份,都有自己的特点。此前,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强行入侵与官僚集团为了挽救王朝的颓危,应运而生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一直有部分破产农民转移到城市的现象,不过这种人口流动是被动的、零星的,未对社会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工业企业的创立,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人口予以补充,自然地破产农民转换成产业工人顺理成章,他们与城市里原生的店员、小贩、退伍士兵、无业居民、手工业者,成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受到工业技术类型与发展区域的制约,近代以降产业工人分布极不平衡:工厂工人大都集中在包括纺织业和食品业在内的轻工业,至于一般的机器制造、化学、冶金等重工业则很少。从性别、年龄格局分布看,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女工和童工占有极大的比重,像近代工业发展初期,练丝、棉纺织、火柴、造纸、卷烟等是颇为热火、流行的轻工企业,它们在技术上要求不高,普遍地使用着女工和童工,这样使得管理和薪酬都极易为资方控制,只要有少量的技术性工人便可投入生产,赚取更多的收入,只有印刷、铁路、机器等行业,才需要更多用于培训等技术性资金的投入。

工人政治,一直是上海工人作为阶级群体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标尺,在现代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早在“八一三”抗战中,上海工人就掀起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据统计,1939年上海全市罢工案计121次,劳资争议案为50次;1940年全市罢工增至286次,一般争议案为71次。^①不过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① 王建生、孙茂生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日本占领公共租界后,工人阶级公开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参与一度几近湮灭。抗战结束,仅在1945年8月至12月间,上海工人就组织过406次罢工,各类工会组织重新崛起,成员大约有80万人,占上海总人口的20%,他们的队伍中已经基本上不包括童工,而技术工人的比例随着第二、第三代工人的增加相应地大幅度增加。^①工人阶级数量的增长,并且积极投身到社会抗争之中,使得阶级身份、集体意识得到强化,群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变得越来越强,他们利用战后恢复生产、前青红帮秘密社团的分裂以及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脆弱,多次捍卫自身的权益并在内部有效地进行了民主化管理,使之成为在上海社会举足轻重且疏离于党派的独立政治力量。

新中国建立后,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模式,为了增强国力,重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城市产业结构有了较大的转换,人口的职业构成也因此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在上海市表现得特别明显。以往,上海的人口商业及服务性行业职工所占比例较大,以至到建国以后产生了上海是一个消费性城市的错觉,当时政府的明确策略是力图将“消费性城市改造为生产性城市”,加之就业机会的限制,使得工人的产业人口分布出现大的调整。^②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也有改变,由敌对变为拥护。梳理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其间以阶级话语的宏伟叙事,逐渐建立起了共产党领导权威

① 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② 上海城市具有“高度的消费性”的理据是,过去上海工业生产方向,都为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服务的,生产产品皆属消费物品。据“工业经济研究所”1948年的调查,上海制造雪茄烟、驼绒、手帕、赛璐璐、热水瓶、钢铁床、罐头、调味粉、化妆品等消费品工业约有三千家,占全上海工厂总数的三分之一,工人数占全上海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参阅《关于计件工资问题——1959年4月讨论会论文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8页注释2。